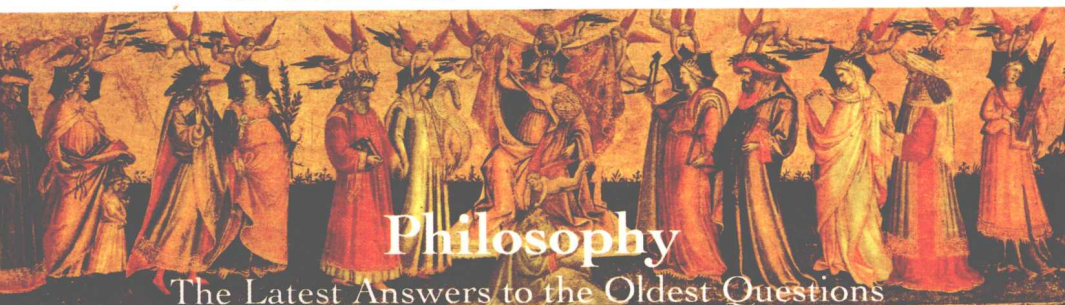


斐然成章，沉博有容

—— 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

[英] 尼古拉斯·费恩 Nicholas Fearn 著 / 许世鹏 译



哲学

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斐然成章，沉博有容

—— 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

Philosophy

The Latest Answers to the Oldest Questions



哲 学

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

[英] 尼古拉斯·费恩 Nicholas Fearn 著 / 许世鹏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英)费恩著;许世鹏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225-308-7

I.哲... II.①费... ②许... III.哲学—研究 IV.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261 号

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

(英)尼古拉斯·费恩/著 许世鹏/译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崑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8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08-7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致 谢

我要向蒂姆·克莱恩(Tim Crane)和阿尔·托马斯(Alan Thomas)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前者帮我策划了此书;后者则在拙作最终成文后对之博考细酌。倘若没有以下诸位慷慨相助,本书亦不可能面世,感谢他们花费不少时间并提出宝贵建议:鲁斯·巴肯·马库斯(Ruth Barcan Marcus)、内德·布洛克(Ned Block)、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泰勒·伯吉(Tyler Burge)、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诺姆·乔姆斯基(Noa Chomsky)、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希安·多尔(Cian Dorr)、休伯特·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斯图尔特·德雷弗斯(Stuart Dreyfus)、杰瑞·弗多(Jerry Fodor)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克里斯汀·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休·梅勒(Hugh Mellor)、鲁斯·米利肯(Ruth Millikan)、马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大卫·帕庇诺(David Papineau)、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约

翰·塞尔 (John Searle)、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查里斯·泰勒 (Charles Taylor)、彼得·范·彦华根 (Peter Van Inwagen) 以及蒂莫西·威廉姆森 (Timothy Williamson)。同样,我还蒙恩于已故的唐纳德·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和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最后,向我的编辑托比·芒迪 (Toby Mundy)、艾利斯·亨特 (Alice Hunt) 和博尼·姜 (Bonnie Chiang) 致意!

序 言

我的理性之所有关怀,不论思辨抑或实践理性,都可归结为如下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能期望什么?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对很多主题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事实上,哲学作品惯用的表达方式令我困惑不解。哲学著述都写得仿佛作者确信它们就是对其主题最终的结论。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

亚里士多德、伊曼努尔·康德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伟大哲学家所以能取得如斯地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彻底的变革,而非渐进之演变。他们宁肯提出全新的理念和体系,也不沿用前人的素材。于是,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史上,思想家们相继在各自的主题画布上你一笔我一彩,线条之多,图像已然模糊难辨。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了某种复归。叠层得以清理,更多幼稚无知的处理得以摒弃。原有的印记显露出来,古代思想家的理念再度大放异彩,当代人则用笔墨修复了那些最为浓重的

线条。得益于论据分析的新技术、对其进行检验的新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新近提供的原始资料，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当前，是回顾审视西方哲学的最佳时机。本书旨在对哲学艺术的现状进行分析，综览近年来在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取得的成果，并探询对最先由古代世界所触及之问题的最新解答。为完成上述任务，我决意向世界各地几次关键性争论的主角求教。最终，这一使命因大多最为杰出的哲学家都集中于一个广袤无垠的地方——美国，而轻松了许多。受访者年事已高让我费力不少，他们当中有的人，譬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蒯因（W. V. O. Quine），我还未及拜访，便撒手人寰。在生者大都还差可人意，不过相较而言有的人更加友善些。不少人将我邀至家中，比如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杰瑞·弗多（Jerry Fodor）和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等，而诸如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人则对记者疑虑颇多，由是拒绝与我交谈。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和泰勒·伯吉（Tyler Burge）亲切地同意我撰写第二稿并回答了后续问题，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却在拂晓前我毫无反击准备之时，致电回绝了我。

最终，我有幸采访到了三十多位全球地位烜卓的思想家。经过起初的几次会面，我留意到我们的谈话大抵趋于一致。他们首先扼腕兴叹自己有生之年人类在哲学认识上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接下来又开始用长篇大论阐释与此相反的论点。似乎典型的现代哲学家都相当地谦逊有礼。一直以来哲学都饱受好高骛远之苦，然则倘若宣称某一哲

学困境已获致最终解决乃愚勇之见,那么拒绝采摭任何貌似毫无价值的观念也同样轻率。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变革在哲学世界早已是明日黄花。人们对问题的解答通常都比以往零碎许多——犬儒主义者没准会补充道,正如力倡它们的思想家那样(渺小)。然而,即便犬儒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对技能的追求现下已达到空前的境地。如今但凡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与古代世界任何一位著名思想家对峙时都应当能够自圆其说。权威少了,巨擘少了,但在各个日益断裂和不断专业化的领域,劳动分工更细了。那些迥然不同的学派表面上大异其趣,实则其一致性往往比初看之下多得多,因为一旦某个领域或多或少被隐蔽起来,坚持探索该领域的研究者就成了离经叛道之人。举例来说,科学家们大都对近来外星人没有乘飞碟降临地球一事额手称庆,可一项对关于“异型诱导”(Alien Abduction)的专题文献的调查却表明,绝大多数所谓的“专家”对不明飞行物(UFO)和小绿怪(little green man)深信不疑。究其原因,大部分科学家更愿意探讨合理的怀疑所无法解决之问题。

哲学已进入“后英雄”时代。当代哲学家们力图不断完善各领域的成果——据“哲学文献中心”记载,全世界有两万六千多名专业人士的典籍——基于其他人文与社科类的最新著述,从而逐步增进人类认识。天才发挥的作用大大减少了,或许由于近年来缺乏如此顶尖的个人,或许由于认可他们是这样的个人颇费时日,但更有可能的,是由于此一学科已自其扩张主义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上述错误之一便是操之过急。19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乔治·黑格尔(Georg Hegel)在其哲学体系中预言太阳系中只有七颗行

星。现在,人们希冀哲学家对逻辑争论之所及与不能及者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哲学家们亦不主张必须将其论题推向极致才能释除哲学困惑。既然已在稳步、持续地向前推进,又何须变革呢。

4 今日的思想家至少可回溯到五次巨大的观念革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至6世纪时作为判断真理之工具的理性的诞生,经由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的遗著和柏拉图对话录为世人所知。柏拉图继承了其师苏格拉底的衣钵,并进而提出,人类的观点正确与否应取决于它是否与超脱尘俗“形式”的美德、良善、勇气,凡此种种,和谐一致。柏拉图把这些模板本身看做是客体——实际上比我们在物质世界发现的客体还要真实,因为它们完美、纯净、永恒而且亘古不变。他强调,恰当地运用理性,我们便能看到这些真相,获得真正的认识并用其取代人类常常津津乐道的纯然的“观念”。唯一的桎梏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素材——物质世界有的仅是永恒真理的劣等复制品。

第二次大变革发端于18世纪的哥尼斯堡(Königsberg),伊曼努尔·康德将侧重点转移到人这一主体上。康德认为,我们目光所及、倾耳所闻,头脑领悟之一切,都要经过感觉、智力等的塑造才能为我们理解。人类决不可能像柏拉图梦想的那样洞察事物的内在本质。我们只能不断地了解某种人为的上帝、美德及良善。在康德的表述中,人类越是熟知自己头脑的能力,真正的认识离我们就越近。我们只能通过探寻人类思想的极限来获知世界的极限。

大约同一时间,英国发生了第三次大变革。约翰·洛

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其17世纪的前辈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科学方法论发展成为一个哲学体系,叫做“经验主义”(empiricism)。据经验主义者所言,人类只能认识自己经验范围内的事物。理性本身无法发掘任何新颖之物,而仅能把感官已经提供的认识再度接合起来。

19世纪,德国思想家乔治·黑格尔列举在创造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方面远胜过理性的历史力量,倡导人们研究“人能成为什么”,而不仅仅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又一次变革拉开了序幕。黑格尔的“辩证法”(Dialectic)描述了相反倾向间的冲突,借此说明“意识自由取得的进展”,并把体现这一进展的国家称作“上帝在世间的行进”。他对理性的上述批判,遭到其德国同胞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动机呼吁论的颠覆。尼采认为,价值的真实性源自个人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而并非借助于任何的佐证或观察。尼采一举奠定了被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反哲学的根基,该主义至今仍在人文学科备受青睐。

待至20世纪早期,对认识之极限的划分愈发狭窄。奥地利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发起了第五次变革,主张思想的轮廓是由它借以开展之语言的极限勾画出来的。评定真理的标准不在于尘世之外,亦非头脑的界限,而是公众惯用的语法。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认为,哲学家们想象自己正探究事物的本质时,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将字词从上下文中拎取出来。在柏拉图那里,研究的特有客体是半神性存在物;黑格尔探讨的则是意识的

结构。如此一来，“分析”哲学家们探讨的对象就被还原成了人类用以往来沟通的咕噜声以及肢体语言。为鼓舞士气，他们也许会穷追猛打直至根除形而上思维的痕迹，并宣布问题被“解除”。例如，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主张，如何定位意识本我这一问题犯了“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就好比某人在参观牛津大学的各个学院时询问该“大学”位于何处，或者看到营团列队行进时问道何时将有“军队”经过。

6 当今的西方思想家都对上述变化熟稔有余，但近年来有一种转变尤其震慑人心：经验论者承诺建立的“科学”哲学。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将人类认识的分支比做一只整理箱，其中哲学家们所讨论的素材被放到标示着“不知道”(Don't Know)的隔层里。一旦对于某个既定的主题我们已经探知甚多，可系统地释疑解惑，此项内容便被转移到另一个隔层里，冠以其他名目，谓之“物理”，或是“心理学”，“经济学”，诸如此类。罗素的这种表述极为贴切地描绘了哲学的沿革：它周期性地导致了新兴学科、新型科学的产生。这也廓清了那些以为哲学一无是处的错误观念。哲学家的功劳向来得不到承认，对某一难题的研讨一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会被从哲学人手中夺走、交予他人。伊萨克·牛顿勋爵(Isaac Newton)、亚当·斯密(Adam Smith)两人均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各自撰写《原理》(*Principia*)和《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的，可二者却分别作为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为后世忆及。当代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ram Chomsky)被誉为哲学家、语言学的创始人，然而其头衔的前半部分迟早会被从百科全书中抹掉。

上述际遇致使近来有人提议,既然哲学似乎功在新兴科学之孕育,倒不如将它整个学科归为一门科学。这种对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信仰,就好像一个小男孩在问爸爸:要是特种航空部队*士兵的性命都危在旦夕,为什么将军不把整个军队编成一个大大的特种航空部队呢。此法对于知识抑或军队都行不通。要求人们总是而且仅是遵照严格的科学原则来进行思考,意味着某些学科——那些我们知之甚少的学科——永远都不会被触及,新的学科也就无从产生。然而问题还不只哲学是孕生观念的最佳途径,因为上述提议假定,每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都必将成为科学方法。哲学与科学间的差别往往在于不同的时机选择,而不是学科分类。不少哲学难题会在科学中迎刃而解。极少数情况下,哲学能释除困惑而未引发新学科的产生,这是由于有时候问题被排除而并非解决了。后文将对相应情形进行细述。

7

某些当代思想家以为物理学、生物学等的主张贸然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他们对那些徘徊于实验室门外的同仁们的“科学妒忌”嘲讽不已,并急于将最新发现的哲学反响公诸于世。有种观点流传甚广:所有艺术与科学中唯有哲学一定是民主的。虽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独自阐发出流体力学理论,或是佯装自己能似海明威那般笔下生辉,但普遍认为任何人都可窥见哲学的真谛。更有甚者,不特每个人都可以若此禀赋天成,而且每个人在过去无时无刻不享用了同样的权益。在其他万事万物上几乎都欠缺公平的世

* SAS, Special Air Service——译者注

界,涉及对最为深邃的真知的体认和领会一事时,却被认定从来就不偏不倚。人们揣想答案可以像苹果那样被任何人抬起。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有的真理跻于较低的枝干上,唾手可得;但还有的真理不发明梯子是不可能达到的。尽管设想以往的哲学家们——通常都绝顶聪明——在偶然发现真理之希望渺茫的前景下耕耘终生,不免有些残酷,但他们当中很多人正是致力于这样的事业。兴许这些思想家提出的理论有失偏颇,其论据也无疾而终,因为他们对问题考虑欠周,或是不够深入。没准还出自更为简单的原因:缺乏适宜的工具供他们挖掘自己搜寻之物,因为当时这类工具压根儿还不存在。

8 上述工具的形式不一:某种特殊的论据,逻辑的方法,大脑扫描仪或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等机械援助物……不论人类的眼力有多好,也绝无可能用肉眼看透点点繁星,弄清夜空中那些刺眼的发光体原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星。另一方面,有了望远镜,即使视力较差的人亦可观测棋布星罗。毋庸置疑,由于我们缺乏后世可能获取的工具,至今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科学对发现真理并非如此的关键,各式各样的技术倒是至关重要。造成以往哲学失利的部分原因与早期研制飞机及治愈疑难杂症未果的原因同出一辙:工具没准备好。虽然哲学看似漂浮于经验事实之外,但实际上它大部分有赖于前者,况且并非所有解惑之门都时刻对所有民族敞开着,匡论个人乎。这或许可让我们略感欣慰,因为它表明我们探询的是独立于心灵而存在(mind-independent)的真理,而不是目光如豆的人类自身问题。

对“民主”哲学的企盼还出自于古希腊人的真理观——他们认为真理在形式上是数学的。哲学的真谛应当像数学定理那样可由基本原则推导出来。这对于所谓的必然真理来说再自然不过了。但就我们所论及的哲学真理而言,它们或许纯属偶然,印诸沙石而非繁星之上。以此条标准来看,哲学史恐怕由始至终都是一部挫折史。哲学这一学科衍生出新兴科学,后者却因支配规律的独断性,比其母体轻松自如许多。每个胚胎都在子宫里留下一段空白,未能伴随婴孩的出生而脱落。

虽然其他新型科学兴许能解决此前哲学家们统筹考虑的问题,但总仿佛缺少了点什么,就好像这并不是我们期盼的答案,或者说与我们脑中的问题相左。寻求答案好似是抓住舞台上魔术师变戏法的手:“你把扑克藏进袖口里了——这算哪门子的魔术!”遭到此种思想严重腐蚀的哲学领域之一即是道德行为问题。英国哲学家 G. E. 摩尔(G. E. Moore)认为,道德是一种无法解析的特性,他称之为“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他指出,一旦我们明确了某项行为的动机——纵使假定它合乎道德——该行为就将不再关乎道德了:“你出于快乐(仁慈,责任,或是其他任何理由)对她伸出援手——道德与此毫不相干!”如果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难怪他们会备受挫折呢。

我们要探求对哲学问题的哲学式解答,但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消除谜团,则答案的语气可能与问题不符。伴随困惑而生的紧张不安会随着疑团的解开消失殆尽。对于那些出于某种形式上较为成熟的逃避主义(escapism),而不是因妖魔鬼怪或不明飞行物的诡奇故事进至哲学圈的人来

说,这想必很扫兴。是外星拜访者们建造了金字塔?不是,但是电脑说不定能够进行思考呢。有人认为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等人的哲学著作直接来源于埃里克·冯·达尼肯(Erick Von Daniken)的《众神轩辕》(Chariots of the Gods)一书。那些出于宗教幻想走上哲学道路的人们兴许更会备感失落。然而倘使他们埋怨新领域提供的答案缺乏原有的安全感——比如,没有上帝,道德终将失去意义——人们就有权提出质疑:纵使存在上帝,我们到底应当怎样恪守道德。

维特根斯坦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等人所走的,是另一条通往哲学之路:数学研究。数学背景或许有助于人们接受哲学研究的某些特殊成果,有助于其理解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所诠释的这种态度:

我有位艺术家朋友,他的某些观点我实在难以苟同。他拿起一朵花,说道:“瞧,它真漂亮。”我表示赞同。他又说:“你看,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看到的是绚烂无比的花儿;而身为科学家的你却将它肢解开来,令它变得了无生趣。”我觉得他甚是愚蠢。首先,他眼中的绚丽对于他人,于我同样存在,虽则我的美学修养兴许不似他那般高深。我能够体验花朵的赏心悦目,不仅如此,我还从花儿身上看到许多他无法看到的。我可以想象当中的细胞,花儿内部的复杂活动同样惹人遐想。不光是这1厘米范围内的美:更小的维度上、花朵内部结构中亦然绽放着美,还有其过程……五颜六色的花瓣是为了吸引昆虫前来传粉这一事实颇有趣味——它意味着昆虫能够辨识颜色。这又引出了一个问

题——低等动物也有审美感？何以称之为审美？千奇百怪的问题接踵而来，而科学知识会使花儿愈加引人入胜、不可思议和让人敬畏哩。〔1〕

那些与理查德·费曼持不同态度的人所怀念的，不是声名狼藉的宗教所具有的解释力（它们大都毫无诠释力可言），而是一种想象当中能令他们安静下来的神秘体验。在融入大众的同时，当代哲学真正患上的，不是科学妒忌病，而是某种魔力饥渴症。

〔1〕 *The Best Mind Since Einstein*, NOVA US VHS, originally broadcast on PBS TV, 1993.

目 录

致 谢	1
序 言	1
 第一篇 我是谁?	1
第一章 本我的问题	3
第二章 自由意志与命运	18
第三章 心灵与机器	40
第四章 肉体与灵魂	60
 第二篇 我知道什么?	77
第五章 认识的问题	79
第六章 意义的问题	98